

论作为民族文学建构者的爱伦·坡

罗 昔 明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爱伦·坡与同时代民族主义文学团体“青年美国人”之间有关民族文学建构理念的冲突以及与著名诗人朗费罗之间的历史纠葛，藉此重新界定坡的民族性身份，展现其民族文学建构策略。

关键词 爱伦·坡 “青年美国人” 民族文学 亨利·朗费罗

民族意识及其影响下民族文学自决的强烈寻求，是我们审视 19 世纪美国文学无法绕开的话题。当时爱伦·坡虽在欧洲（特别是法国）早已声名远扬，但并未获得爱默生等本国文界要人的认可和肯定，被他们从民族文学传统中排除。他们认为爱伦·坡的作品经常表现出对法国、英国等欧洲场景的援用，有时甚至模糊或完全空置具体场景和时间标记，严重偏离了他们主张的美国民族文学的建构。爱伦·坡的文学理想似乎“疏离”于美国性，他本人也常被界定为是一个没有本土特点的天才，一个迎合市民口味的商业写手或无国别的纯文学作家，一个无根的精神漂泊者。

1941 年，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马锡森在其名作《美国的文艺复兴：爱默生和惠特曼时代的艺术及表达》一书中提出了“美国文艺复兴”这一重要概念，描绘了 19 世纪中期美国文坛一片欣荣热闹的景象，并选定霍桑、麦尔维尔、爱默生、梭罗及惠特曼为这一复兴时代的文学大师和民族灵魂的导引者，完全没有提到爱伦·坡。^① 马锡森一书被视为美国文学批评的权威范本，他的这种定位对后来的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无论是爱伦·坡毕生作为报人的职业身份和主要为报刊撰稿的写作方

^① See Francis Otto Matthiessen, *American Renaissance: Art and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Whit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p. xii.

式，还是其创作对本土色彩的背离，他建构民族性的努力都不能被轻易抹杀。其实，在爱伦·坡死后不久，就有几个评论家不满于爱伦·坡的民族抱负被无视或否定，开始探讨其文学活动的民族性问题。哈米尔顿·迈比在 1899 年的一次题词中，将爱伦·坡置于回应艺术自律的美国文学伟大解放者的地位，并认为爱伦·坡担起了启蒙庶民大众、继而提升美国民众“民族性”的重任，藉此爱伦·坡成为一个美国个人主义的闪亮范例。^① 1909 年，肯特和佩顿在为爱伦·坡百年纪念日所撰的纪念文章中指出：“虽然在我们的杰出文人中，爱伦·坡似乎最没有‘美国性’，……但其实坡清晰鲜明地坚持民族性……[他]毫无争议地是美利坚民族浪漫性的代表人物。”^② 坎贝尔教授则认为爱伦·坡在他的作品中展现了本土环境的影响，但同时也承认爱伦·坡的“美国化”只是“模糊或难以理解”地被体现和反映。^③ 达尔纳尔·索斯从美国民族性固有的理想主义、浪漫性及个人主义三方面来分析爱伦·坡，认为正是这些方面将他与美国人独特思想的内在品性和态度紧密地联系起来。^④

当时一些评论家甚至从具体的地域角度来审视爱伦·坡，强调其文学观念和风格所含有美国南方特性，认为爱伦·坡作品中的反物质主义、对唯美的迷恋及对高贵精神的追求都是当时南方文化传统的体现：“爱伦·坡……是南方的产物……他的思想方式、思维习惯、感知模式是南方性的；他的感伤主义、他认为女性气质是南方的特性这一观念、他对男子气概及其行为的认识、他性格的特点，都带上了南方出身的烙印。甚至他的气质、他的感性、他的忧郁和梦想，他对色彩和音乐的反应，都是美国这一民族这一地方的产物。”^⑤

的确，爱伦·坡不仅没有远离“美国性”，而且 19 世纪美国文人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出的建构民族身份话语的迫切感和焦虑感也成为萦绕着他的挥之不去的“幽灵”。正如朱利安·西蒙斯所言：“[爱伦·坡] 常常心怀对本国文学的忧虑，他认为本国文学应与英国文学处于同等地位。”^⑥ 不过爱伦·坡对美国文学书写的认识与建构和同时代人有所不同，他跳出了美国文艺复兴主流民族话语的束缚，既身处民族运动之内又置身于外，以积极、批判和审视的姿态来展开他的民

① See Scott Peeples, *The Afterlife of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4, p. 18.

② Qtd. in Scott Peeples, *The Afterlife of Edgar Allan Poe*, p. 18.

③ See Killis Campell, "Out of Space, Out of Time", in *Studies in Philology*, 7 (1923), pp. 19-27.

④ See Darnall Source, "The Americanism of Edgar Allan Poe", in *The English Journal*, 3 (1927), pp. 51-62.

⑤ George Woodberry, *America in Literatur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03, p. 22.

⑥ 朱利安·西蒙斯《文坛怪杰：爱伦·坡传》，文刚、吴穗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 191 页。

族文学建构理想。本文着眼于探究爱伦·坡与民族主义文学团体“青年美国人”之间在民族文学建构理念上的冲突,兼及他与著名诗人亨利·朗费罗之间的历史纠葛,以充分展现爱伦·坡的民族性及其民族文学建构策略。

—

“青年美国人”文学团体的形成,源于19世纪初“青年意大利”组织掀起的欧洲政治革新运动。该运动波及美国,激起美国一些知识分子以“提倡自由贸易、社会改革、领土扩张”等主张形成了一种政治联盟“青年美国运动”,“青年美国人”便是这一运动在文学领域的表现。这个团体是由艾佛特·杜依金克、科涅纽斯·马修斯、约翰·奥沙利文等一些作家和报刊编辑组成的松散组织,其精神领袖马修斯在一次演讲中曾如此表达这一组织的愿望与宗旨:

过去一代的政治家、立法者以及作家会什么,我们很清楚。他们所获得的,他们未能获得的,我们也知道。较这些而言,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与之不同。……民族化的青年美国……正是我们现在要探究和在我们的能力之内所要实现的,也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的问题并为之奋斗的目标。^①

“青年美国人”在政治意识上倾向于民主,在文学创作上注重民族主义,而且还致力于寻找有创意的“美国天才”,由此吸引了当时许多杰出的作家,包括威廉·布莱恩特、乔治·本考福特、麦尔维尔、霍桑以及爱伦·坡等人的短暂加盟。这个团体的中心阵地在纽约,主要工具是文学杂志,由马修斯和杜依金克担任编辑的文学期刊《大角星》是团体的核心媒体。此外,这个组织还得到《美利坚杂志与民主评论》和著名的纽约威利·普特南出版社(New York's Wiley and Putnam)等许多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报刊和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后者专门为他们提供优先发表的版面。

青年美国运动的骨干一直是精英人士,其创建成员本质上是一群富足的文人,他们全力支持国际版权法并积极推动该法在美国本土的实施。通过这种民粹主义倾向,他们的奋斗目标与激进的民主党羽翼及其主要出版物《美利坚杂志与

^① Qtd. in Edward Widmer, *Young America: Flowering of Democracy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10.

民主评论》相联系，并从中吸取了力量并赢得声望。杜依金克、马修斯、威廉·琼斯等人构筑的运动中心，联合了《美利坚杂志与民主评论》主编奥沙利文的力量，扩大了这一肩负共和国文学自决的运动的运动的影响，并逐步向美国民众灌输适当的民主习惯和激进、狭隘的民族主义。起初，这种联盟显得无比乐观自信，联盟的成员们怀抱着神圣崇高的理想和追求。他们认为美国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存在过于依赖欧洲文化体系和话语方式的倾向，或对它们进行过于简单化和模式化的移植，根本没有展现出本国文化的精神特质。简言之，他们所呼唤的是：美国民众，尤其是本国知识分子在面对以英国为主的外来文化因素的时候，要有鲜明的文化自决和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的建构应该立足本土特色去寻求灵感。1845年，杜依金克在《文学章程》中表达出一个行动的号召：要在文本中强化国别特色的辨别和区分。^① 同一年，他倡导发起“美国书库”和“精选读本书库”文本再版系列。而另一成员马修斯则在强调民族差异的同时，更加焦虑于本民族身份的不稳定性，呼吁建构美国的清晰身份。

爱伦·坡曾是这一派别的盟友。早在1835年，爱伦·坡还在弗吉尼亚的里士满担任《南方文学信使》的编辑兼撰稿人时，就在该刊发文对西奥多·塞奇威克·费依的《诺曼·莱斯利：一个当代故事》进行批评和嘲讽，指责作品中的情节内容不仅荒唐可笑、自相矛盾，而且还毫无个性。几天后，爱伦·坡在另一篇评论中将这一批评予以深化：“当我们把《诺曼·莱斯利》当作世界上最愚蠢的作品时，我们还完全没有见到《保罗·乌尔里克》这本书……[这样的书]每天都在败坏民族文学的声誉。”^② 此外，爱伦·坡还攻击了当时聚集在《纽约镜报》周围的辉格党派文人，认为他们只会“在外国游荡”，“已忘了本国语言”。^③ 爱伦·坡的评论笔调赢得了“青年美国人”的器重，“被默认为”是同道中人。一来，这是“青年美国人”自身主张建立民族文学的思想倾向使然；二来，在19世纪30至40年代，纽约文学界由杂志和杂志编辑所主导和垄断，并形成了两大松散的文学组织，即推崇“本土化”的拥有民族主义思维的文人与被称之为亲（欧）英派的辉格党作家两大阵营（《纽约客》和《纽约镜报》分别是其代表），催生了水火不容的纽约文学大战，爱伦·坡对辉格党派文人的批评自然被“青年美国人”所激赏。

① See Joan Dayan, *Fables of Mind: An Inquiry into Poe's Fi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36.

② 埃默里·埃利奥特《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朱通伯译，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220页。

③ 萨克文·伯科维奇《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二卷），史志康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70页。

1844年,离开了《格雷汉姆杂志》的爱伦·坡在漂泊闯荡几载之后迁居纽约。刚到纽约不久,爱伦·坡就在《美利坚杂志与民主评论》上发文,为“青年美国人”盟友之一威廉·西蒙斯的民主思想辩护,认为“西蒙斯先生已经犯下了许多过失……然而,他超出了布洛克登·布朗和霍桑(他们每位都是天才),毋庸置疑是美国最好的小说家。”^①这次迁居纽约,之前与“美国青年人”主张的应和,纽约的文坛氛围及爱伦·坡在纽约的活动等多重因素,使他与这个杰出的文学民族主义群体的联系愈加紧密,甚至直接被认为是其中一员。藉此,爱伦·坡也从这种联系中大大受益,其诗歌和故事集获得了出版支持,而且他还在1845年获得文学周刊《百老汇杂志》的部分所有权。所以,应该说,“青年美国人”凭借自身在文学界和出版界的影响力,给爱伦·坡的报人职业以及文学事业都提供过极大的帮助和支持。

“青年美国人”对爱伦·坡青睐有加,如曾是“青年美国人”骨干之一的詹姆斯·洛威尔在1845年2月的《格雷汉姆杂志》上发表传记性文章《我们的撰稿人:埃德加·爱伦·坡》,不仅阐明爱伦·坡日益融入纽约文学环境,也致力于将爱伦·坡的形象本身吸纳进文学民族主义话语之中。

在写这篇传记前,洛威尔曾要爱伦·坡提供他的生平履历,而且要他为传记提供“对你一生的你自己的评价”^②,但洛威尔最终还是按自己对爱伦·坡的理解写就了这篇文章。不久后,这篇极富善意地总结爱伦·坡的日常生活和文学活动的文章,被纽约、费城以及巴尔的摩等地的报刊持续关注 and 转载。杜依金克对洛威尔的文章尤为赞许,在文章发表后不到一周,就在一家报纸上写道:“我们真诚地欢迎对坡先生的优点和独特价值的认知。无论何时他的名字被提到,他都一直是引人关注的人,一个天才。”^③这篇传记性文章经由多次再版,加之杜依金克等文人学士的进一步增温及随后的播散,可以说是爱伦·坡在公共视野赢得认可的标志性事件。杜依金克还在极具威望的《美利坚杂志与民主评论》上为爱伦·坡留下专栏版面,让爱伦·坡的大众识别度再获提高。1845年11月,爱伦·坡开始在美国主要城市作“美国诗人及诗歌”的巡回演讲,上述支持充分确保了一个广泛且利于接受爱伦·坡演讲的大众空间。

① <http://www.eapoe.org/works/misc/mar1244.htm>, 2010-09-02.

② 朱利安·西蒙斯《文坛怪杰:爱伦·坡传》,第111页。

③ Qtd. in Dwight Thomes and David K. Jackson, eds., *The Poe Log: A Documentry Life of Edgar Allan Poe, 1809-1949*, Boston: G. K. Hall, 1981, pp. 492-494.

不过,“青年美国人”这个激进的文学民族主义群体在为爱伦·坡的文学事业提供支持的同时,也使后者的形象和职业活动陷入民族主义的狭隘泥沼。从1843年初爱伦·坡开始策略性地逢迎他们的喜好,到1845年10月他有部分所有权的《百老汇杂志》破产,这一段时期是爱伦·坡屈从与讨好“青年美国人”的阶段。惯于坚守独立批评声音的爱伦·坡此时反复向杜依金克的圈子妥协,牺牲独立的声音以便一定程度上接合“青年美国人”的文学和政治目的。^①但从本真的意愿上讲,爱伦·坡不可能真正成为其中一分子,因为他曾多次反对那种头脑简单且狭隘赞同“严格的美国主题”的主张:

现在的口号是,我们要一种“民族文学”!——似乎任何真正的文学只能是“民族的”。突然间,我们成为文学中讲究纯粹性的疯狂党徒。我们的文章谈到“关税”和保护,我们的杂志习惯于添加关于“真正的本土小说家库柏先生的段落”,我们的评论促成了本土性,我们的书商的口号宣传体现了“严格的美国人主题”的必然性。在这个时代,一个外国主题,足以将堪称国家最好的作家拖入批评谴责……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更喜欢愚蠢至极的书,只因为其愚蠢是局限于我们本身事务和主题的美国式愚蠢。^②

因此,“青年美国人”对爱伦·坡敞开胸襟,实际上是在拥抱一种他们心目中的“美国式”文学,这种文学“完全摒弃了外来文化影响的痕迹……它是在民族生活、民族思想和民族题材的基础上,以民族的形式来进行描绘和叙述的,具有纯粹的美利坚民族特色。一句话,就是以美国社会为背景,以美国人民为生活题材,用美国人民乐于接受的艺术手段而写出来的美国文学”^③。但严格来说,将这种文学思路强加于爱伦·坡身上,应是“青年美国人”成员对爱伦·坡一厢情愿的误读。

二

事实上,爱伦·坡对美国文学的狭隘民族主义理想的奚落与不屑,在他的批

① See Richard Claude, "Poe and 'Young America'", in *Studies in Bibliography*, 21 (1968), pp. 16-24.

② Qtd. in Meredith McGill,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ulture of Reprinting, 1834-1853*,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55.

③ 毛信德《美国小说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评实践中处处可见,典型例子便是他曾对“青年美国人”骨干成员马修斯颇有微词,后者1841年所写的《瓦孔达》(Wakondah)^①这一民族史诗,因过于狭隘的本土意识受到坡的尖刻批评。^②在缔造民族文学、确立民族认同的走向中,爱伦·坡固然也想完全摆脱欧洲传统的束缚,因为如果依然拣食“舶来品”,放弃建构自足的民族认同,奴颜屈膝的新兴国家何谈“未来”;但在没有厚重历史文化积淀的不利条件下,他也犯上了知识分子的心病:面对文化贫瘠的现实,“美国人拿什么去创造文学”?^③

美国文学中固有的“民族性”到底是什么?对此爱伦·坡并没有从“青年美国人”那里得到满意的答案。至少在他看来,仅仅将题材和文学主题限定于美国本身这种策略并不可行,这里所谓的美国“民族性”不过是一种极端的设想和盲目排外的自恋行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思维,它们与真正要发展的民族文学事业相去甚远。1845年底,爱伦·坡在一封写给批评家菲利普·库克的信中抱怨杜依金克对作品的选择已经走向了一种狭隘民族性的极端,并明确表达了对文学民族主义这种追求整体划一风格的倾向的拒绝。^④

但另一方面,爱伦·坡也反对同时代著名诗人亨利·朗费罗不分彼此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念。朗费罗喜欢抹除一些文本的欧洲文化来源,对之重新包装,将其投放美国市场;即使是那些基于美国本土题材的作品,他也沉迷于一种模糊文本身份属性的生产策略和传播策略,对此,爱伦·坡颇为不满。1839年10月,他在《伯顿绅士杂志》上发表《刻伯龙神:一种罗曼司》一文,对朗费罗的叙事长诗《刻伯龙神》表达了极大的失望:“朗费罗不敢从事健康的民族文学事业,对此,我们深感愤怒。”^⑤朗费罗的《刻伯龙神》借一个沿着莱茵河无目的游荡的忧郁旅行者、美国人保罗·弗莱明之口,将他从邂逅人们那里收集到的各种歌谣和民间故事松散地接合在一起。作为波士顿文学圈极具影响的文坛雅士,朗费罗早已成为指引民族文学另一方向的领军人物,然而在朗费罗日渐扩大的声名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像《刻伯龙神》那样的无关民族主义的诗歌,它们模糊文本最初的地域性与文化属性,而偏重其流行性和市场的流通性。从这个意义上

① Wakondah 即美国本土印第安人信仰中的“灵”,即万物皆有自身特质的灵性。

② See G. R. Thompson, ed., *Essays and Reviews*,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4, pp. 823-833.

③ 详见杨金才《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阐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④ See Dwight Thomas and David K. Jackson, eds., *the Poe Log: A Documentary Life of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 p. 579. 这一批评引起了杜依金克的不满,爱伦·坡也最终与激进狭隘的“青年美国人”团体划清了界限。

⑤ <http://www.eapoe.org/works/criticism/bgm39j01.htm>, 2011-02-22.

而言,爱伦·坡对朗费罗的攻击,阐明了对外国文学的取材和挪用的局限和界限。

1845年1月中旬,朗费罗在《晚镜报》分期匿名发表了组诗《流浪者》,不久爱伦·坡在《每周镜报》两度发文对之予以专题评论,指出了其中的诗歌匿名性策略,由此也引发了一连串的信件往来和回应性评论。^①《流浪者》由50首诗歌组成,其中17首是匿名的,只能识别出总序是朗费罗所写,^②而爱伦·坡却坚持认为所有未署名的诗歌都出自朗费罗之手。而且,让爱伦·坡苦恼的不是朗费罗诗歌总是从别的素材衍生而来,而是朗费罗式“模仿”的不加区分和辨别,爱伦·坡对这种行径深恶痛绝,甚至有一次直接批评朗费罗是“文抄公”。

尽管这场论战给爱伦·坡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迪科勒·费尔德等知名公司不再出版其作品,得罪了好友洛威尔,也得罪了曾有恩于己的朗费罗,但爱伦·坡传递出了他的民族文学观念,即美国人要从无主体个性书写的“我们”中挣脱出来,建立真正的美国文学。

爱伦·坡在批判朗费罗无个性挪用的同时,又极力为自己适当借鉴模仿的合法性辩护。他认为借鉴性模仿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恶意的窃取或无个性的挪用,而应视为“真正的诗人”获取灵感的重要来源:

“真正的诗人”极其赞赏的[那些外来文本],成为他自身才智的一部分。这种构成部分有一种衍生性的起源,来自于他自己的灵魂。尽管它起初有某种外来的原初性,但它最终完全偏离了那个源头。诗人的头脑因此被另一个人的思想占据,我们无法说他是拿来占为己有了,但是无论如何,诗人完全感觉它是自己的东西,只有它感觉得到的存在、只有它在诗人从中获得灵感的书籍中的显然存在,才会抵消这种感觉。在漫长的岁月流逝中,这个起源几乎不可能不被忘记,因为其间那个思想自身被遗忘了。但是最为脆弱的联系会使之再生,它将以新生的全部活力迅速成长,其绝对的原初性甚至不应该被怀疑。因此,当诗人完成创作并将之发表时,如果指责他剽窃,那么世界上最大吃一惊的人应该就是他自已了。^③

① 这场纷争被称为美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朗费罗的小战争”(the Little Longfellow War),历时半年之久。关于这场纷争的详细内容,详见 <http://www.eapoe.org/people/longfellow.htm>, 2011-02-22。

② See Meredith McGill,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ulture of Reprinting*, p. 208.

③ Qtd. in G. R. Thompson, ed., *Essays and Reviews*, p. 759.

在此，爱伦·坡完全赞成真正诗人的借鉴性模仿，原初的著作所有权和思想可能是别人的，但是诗人经由文学再生产而彻底地“感觉是自己的”，这种原初“以新生的全部活力迅速成长”。可以说，爱伦·坡在他的最终论断中表明，真正的诗人实际上更倾向于模仿，本土作家应通过模仿来追逐原创性。

朗费罗在出身、教养和创作倾向方面与曾是“青年美国人”干将的洛威尔有许多共同之处。朗费罗无差异的世界大同主义文学观念，事实上在修正甚至可以说倒戈了“青年美国人”思想的洛威尔身上也早有苗头。前文提到的洛威尔所撰写的爱伦·坡评传，在扩大爱伦·坡声名影响的同时，也表明他自己开始反对狭隘自足的文学民族主义。他认为最佳的作品没有国界，一个作品具有世界性是它能流传后世的条件，这点与朗费罗的看法大同小异。但是爱伦·坡既不赞同文学民族主义的激进目标，也拒绝世界大同主义的文学梦想。他追求在美国文学场域接受“不协调”场景写作的丰富性；转换欧洲的文化形式为美国大众提供消费的愉悦；维持灵活多变的写作策略；追求文学实验性或元叙述的无限快感。他希望苦心经营民族文学的多样性，从而展现一种美国文学未来的独特想象图景。^①

三

在爱伦·坡时代围绕民族文学建构形成的多元派系中，至少有两大突显的派系与爱伦·坡的民族文学建构观念密切相关：一是“青年美国人”，代表着保守、激进、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这部分知识分子认为面对当时美国文化自主意识的缺席，需要降低外来文化的影响，增强本土文化的凝聚力和表现力。而文化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向，则是朗费罗代表的“世界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它主张利用外来的因素和范本，完全不加限制与选择地与本土文化和地方传统相混合，削弱民族国家之间的分界。在此之中，爱伦·坡用其独特的对立和批判姿态来展现自己的建构策略，即融合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熔炉”意识。

爱伦·坡所理解的民族文学生产，应采取与英国传统对话（而不是抵制）的开放姿态。毫无疑问，在美国独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方面，英国传统一直处于支配地位。爱伦·坡乐于承认美国文化是英国文化的衍

^① See G. R. Thompson, ed., *Essays and Reviews*, p. 189.

生,对他而言,美国文学应该扎根于英国文学传统之上。他本人的创作就是通过移植和革新欧陆传统,尤其以英国文学为师,间或融入美国本土景观,来赋予作品美国特色。

爱伦·坡的创作,特别其早期写作,明显带有欧陆渊源。他早期出版的两部诗集《帖木儿及其他诗歌》、《阿尔·阿拉夫·帖木儿及其他小诗》,都曾效仿拜伦、雪莱和柯勒律治等英国诗人。不过,爱伦·坡并非直接沿用英国文学里的陈词滥调,而是对欧陆源泉有着扬弃式处理,他一些作品标题的微妙变化就能够明显体现这一点。以短篇小说《失去呼吸》为例,在这个布莱克伍德式^①的煽情故事中,爱伦·坡引用托马斯·莫尔《爱尔兰歌曲集》的诗句“哦,别呼吸他的名字”(Oh! breathe not his name),给该故事添加了题头:“哦!别呼吸……”(Oh! breathe not, etc.)。这一不完整引用,既点明其故事的戏仿主题,同时也把莫尔的诗视为美国读者的共同财产。1846年,《百老汇杂志》再版该小说时,爱伦·坡又添加了一个戏仿性副标题:《一个在“布莱克伍德”内外都没有的故事》(*Loss of Breath: A Tale Neither In Nor Out of "Blackwood"*)。这一副标题更清楚表明爱伦·坡寻求突破源自于英国的“布莱克伍德模式”的努力。尽管对于伴着这类杂志成长、深谙其市场意义的爱伦·坡而言,“布莱克伍德式”这一文类能让其作品对读者充满诱惑和吸引力,^②但他仍然努力疏离这种文学模式,力图以通俗小说载体表达严肃的文学追求。他一方面向读者群呈现文学的高雅性与通俗性共存的暧昧立场,开启了文本的双重指涉空间,另一方面也明证了英国经典是美国文学的共有财产。^③

爱伦·坡的许多文本都充满了精心设计的“无根漂浮”的场景或欧洲环境,或许这是他常常被拒之于美国文学主流之外、被视为疏离于美国文化的重要标志,然而正是在这种设计中,爱伦·坡却接合了外来性。爱伦·坡需要从外来文化中获取文学灵感,而非仅仅继承已有的文学规范,因此他时常流露出对奴性地复制外国文本的轻蔑,而更乐于将移植欧洲的文学惯例与提升美国主题予以结合,并视之作为一种对“殖民化”有所裨益的延续。他正视美国文学中英国文学

① “布莱克伍德模式”,源于1817年创刊的英国杂志《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因其刊载的作品多为“恐怖、耸人听闻”等迎合或刺激大众口味的故事而在英美市场获得了广大的读者群和巨大的销量。该刊的选材风格,不仅对英国本土作家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等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还对美国作家爱伦·坡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② See Jonathan Hartmann, *The Marketing of Edgar Allan Po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76-77; 也参见朱利安·西蒙斯《文坛怪杰:爱伦·坡传》,第226页。

③ See Meredith L. McGill,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ulture of Reprinting, 1834-1853*, p. 154.

传统的渗透与融合，以兼容、互补的姿态与英国等外来传统一道，组成巨大的和弦，藉此寻求摆脱英国乃至欧洲文学和文化束缚的路径，创建美国文学的想象世界和独特的文学方式，促进美国文化贫瘠现实中的民族文学自决与强势化。这种接合历史、正视现实并着眼于美国文学前景的理路，预示着美国文学逐步从一种学习借鉴性文化，转向文化输出的强势文化。

纵观爱伦·坡奔波的一生，是经由 19 世纪美国五个主要文学中心构成的一出人生大戏：波士顿、里士满、巴尔的摩、费城及纽约。爱伦·坡的生涯轨迹几乎踏遍美国内战前所有重要的文学中心，奔波游走于它们之间，客观上为我们记录了一种民族文学建构的“交战状态”的真实场景和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在反对盲目、无辨别性地挪用、模仿的同时，爱伦·坡并不排斥策略性的移植和借鉴，而是主张在此之中适当地赋予本土特色；在反对激进民族主义路向的同时，也力图从欧洲乃至世界卓越的文化遗产中学习，从中脱胎换骨般地建构自身的民族文化和自我认同。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霍桑、麦尔维尔甚至思想激进、有“反历史”之嫌的爱默生和惠特曼这些同为新兴美国谱写赞歌、曾为民族文化创造神话的知识分子先驱和民族精神导师身上，依稀可见与爱伦·坡的民族建构意识的暗合之处。爱伦·坡的文坛生涯拥抱了美国文化的欧洲（特别是英国）起源，他在熟谙时代商业性文学规约之时，亦使严肃的文学与民族话语糅合起来。他在英国文化传统与美国贫瘠的文化现状相互交织的空间里，既延续了传统文化，同时又呈现了处于多元文化交汇之中的民族身份的复杂性。藉此，他的民族文学建构理想是在英国支配性传统与民族自主创新的张力性关联中寻找新的连接点，试图营构一种动态的民族文学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 罗昔明，男，1979 年生，博士，江苏大学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 19 世纪美国文学与文化。

责任编辑：严蓓雯